

第一编“五四”前后的文学 革命运动

绪论 由‘五四’到‘五卅’的文艺思潮之社会背景

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后一次划时代的社会政治运动。除了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官僚的作用以外，作为这一运动的主要内容而且比较有成绩的，就是新文化运动。

所谓‘新文化’，在‘文化’之上加上一个‘新’字，是指资本主义文化不是指比资本主义低一级的封建文化，也不是指比资本主义高一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和封建文化的没落，是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封建经济的没落的。在 18 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势力非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可的时候，相应着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化，出现了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不灭的光辉的‘启蒙运动’。在英国，在德国，在俄国，以至在其他各国，在新旧经济关系的蜕变之中，必然有一次新的文化运动出现。那么，“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什么时候奠定的呢？

中国的机械工业，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侵以后的产物，所以张之洞、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新旧转变期中的意识的反映，也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三民主义的鼓吹和国民革命的胜利，粉碎了二千

多年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建立了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民国。可是在辛亥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势力仍非常幼稚，经济的未成熟性，使文化运动不能与社会政治运动配合起来，使文化运动不能作社会政治运动的有力的连环，民国终于流产了，变了不伦不类的共和制。

但是，辛亥革命后的三年，震撼全世界人士视听的世界大战发生了。在这四年的血战中，因为无论协约国方面或同盟国方面，都专心一意应付战场上的敌人；既不能在东方市场伸张势力，而国内食粮及其他日常用品，反靠东方各国的供给和补充。只剩下初期中立的美日两国，仍在中国市场上纵横驰骋。尤其是日本，在金融上，在财政上，在工业上，布置了新的天罗地网。然而在那时候，中国的新兴工业也膨胀起来了，中国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的压迫放松中兴起了。

代表这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除外），希望排除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独占与割据，希望实现中国的工商业自立，同时希望刷新中国的政治，所以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日益显著起来。“五四”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正是在此种觉醒状态之下勃发起来的（俄国的“十月革命”也给这一运动以很大的影响）。相应着这种经济政治的情势，于是在文化方面就有“新文化运动”的出现。

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是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怀疑精神，提倡个人主义，提倡废孔孟，铲伦常。如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新青年》六卷一期）里所举出的新文化的两大任务。一是拥护“德谟克拉西”，二是拥护“赛因斯”：

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这些内容，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就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封建思想。如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科学是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个人主义，怀疑精神，是指示个人的解放，对独断，对礼教，对盲从，对迷信的一种抗议。对孔孟，对伦常，提出废止或铲除，那是表示对一二千年来束缚人们的礼教的抗议。虽然这一种运动是由中间层知识分子喊出来，但这资本主义性的文化运动，却有与它相一致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由于急进知识分子一呼，北京学生的一动，全国各层民众就来了一个广泛的响应了。

这种基于经济原因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无论是传播新思想或评判旧思想，封建文化的表现工具——文言文，无论如何是不能担当这新的使命了。故必须用接近口头语的浅显明白的白话文，来表情达意，来作表达科学表达新思想的工具。这是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内容’变了，要求表达它们的‘形式’非变不可的缘故。个人的努力（如胡适、陈独秀等的提倡）固不能否认他的作用，但社会的原因则实为基本。白话文的提倡或新文学运动，虽然起于“五四”的前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 1917 年发表），但获得了波澜壮阔的发展的，则仍在“五四”以后。可以说“五四”使白话文很广泛地流传开去；“五四”使新文学得到了一日千里的发展。

在提倡白话文，攻击古文或文言文，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领域里，所反映的思想倾向，与在其他文化范围内是一样的：反对雕琢的阿谀贵族文学，反对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反对迂晦的艰涩的逃避现实的山林文学；要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反对模仿古人，因袭旧套，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反对‘文以载道’，不过这里所说的‘道’是指的儒家的封建思想，反对过去一切古文或文言文的作品，而推崇白话化的词典和白话小说，在文学思想方面，主要的是进化论的思想；其他如朦胧的社会思想和人

道主义的思想，也萌了芽；反封建的思想，当然是充满了新文学运动的整个内容了。

这样蓬勃发展的反封建的新文学运动，倘有一往直前的独立强壮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土壤，是很可以开出一些较好的文艺的花来的。所可惜的，是中国资本主义有先天和后天的缺陷：先天的缺陷是资本主义不能全靠自力诞生，而必须靠外力促成；后天的缺陷是新兴工业在外压力的松懈中兴起，一等到大战平息了，旧有的外压力回复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是遇着最大的暗礁了，停滞了。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以后，外国资本对中国的掠夺战日益加剧，幼稚脆弱的民族资本终于抵抗不住如潮水一般的外国商品与资本之侵入了。中国民族工业在外资的压迫之下大多数宣告失败，于是资产阶级消沉下去了，五四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上不能不承认为流产了。

以这先天不足，后天天折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基础，反映到新文学运动上来的，是先有代表封建古文势力的林纾“学衡派”（梅光迪、胡先骕等）及“甲寅派”（章士钊等）的进攻，后有新文学运动的首脑人物的投降，胡适等“整理国故”去了。这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内的分化：一派向着“整理国故”的路上走，一派向着科学的世界观的大道上迈步前进，代表着社会阶层的两种势力；一种是投降于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一种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自然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劳动阶级的势力是要到“五卅”才抬起头来的。

五四运动的结果，在民族解放上是流了产，在政治上也未得丝毫的刷新，依然是漆黑一团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和不断的内战。而新文化因为受了外来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却走向了科学的发展；新文学也并不因为有些人去“整理国故”而埋没在故纸堆中，由于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的输入，是从反对旧的，同时向世界文学的浪潮里冲去了：于是中国也有了它的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

作品和思想，这就形成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对立，也就是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辩论。中国贫弱的资本主义的资产者文学的创作方法论，算是在这里作了一下反映，因为五卅时代的到来，中国文学不但早已不再“为艺术”，而且也不再笼统地“为人生”了，它有了新的使命！

第一章 概论——从1917年到‘五卅’的中国文艺思想界

一 文学革命的经过

1917年1月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他自己说是这次“文学革命的第一次正式宣言书”,虽然当他在1915年还留学美国时,和他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通信,即主张白话诗文;但那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并未公开发表,故对社会无什么影响,所以本书不把它作为这次文学革命的开始。

《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改良文学须从八事入手:

- 一、须言之有物。
- 二、不模仿古人。
- 三、须讲求方法。
-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 五、务去调调套语。
- 六、不用典。
- 七、不讲对仗。
- 八、不避俗字俗语。

此八条，后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改为“八不主义”，即——

- 一、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
- 二、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
- 三、不用典。
- 四、不用套语调调。
-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 六、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
- 七、不模仿古人。
- 八、不避俗语俗字。

胡适当时的文学思想，是历史进化的思想：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文学改良刍议》

后在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说得更详细：

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绝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

成为真文学。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岂不以此为吾国文学趋势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吾辈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强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将犹鄙薄之，以为小道邪径而不肯以全力经营造作之。

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他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日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日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日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1917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内中钱玄同的意见可以补正胡适的主张。钱是章炳麟（太炎）的门人，精研音韵训诂学。他从文字学上证明古代言文一致，又修正胡适许多意见；如胡适说：“狭义之典，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钱玄同则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1917年2月钱玄同寄陈独秀书）刘半农亦发表其《我之文学改良观》，对散文韵文的改良表示意见。

1918年的《新青年》内,文章始完全改用白话。4月发表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意说: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惟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的国语。

1918年冬,陈独秀等又办了一个白话的《每周评论》。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出了一个白话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是“The Renaissance”,本义即欧洲十六七世纪的‘文艺复兴’。这些杂志(连《新青年》在内)不但提倡白话,反对文言,而且反孔孟,反旧思想,攻击旧伦理,旧道德。于是守旧派就纷纷起而反对;北京大学内部的反对分子出了一个《国故》,一个《国民》,都是拥护古文学的。林纾在《新申报》上做了好几篇小说痛骂北京大学的人(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反对者又想运动安福系的国会出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也失败了。

二 林纾的反对

1919年3月间,林纾作书给蔡元培,攻击新文学运动,并涉及“覆孔孟”“铲伦常”的话,蔡元培也作长书答他。这两书很可以代表当日“新旧之争”的两方面。

三 “五四”推动了白话文的发展

林、蔡辩论后一个多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于是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各地的学生团体出版了无

数小报纸，全用白话。此外又出版了许多白话杂志，如《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后名改造）、《少年中国》，都鼓吹新文学新文化。日报副刊中著名的有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三种。1920年以后，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地白话化了。林纾的反对论不但不发生效果，且成为青年取笑之资。

四 “学衡派”的反对

自此以后，白话文便很广泛的流传开去。到1920~1921年白话公然称为“国语”了。而反对的声浪并未全消：1921年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了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对新文化新文学都作了激烈的攻击。

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内说：

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吾国文学，汉魏六朝则骈体盛行，至唐宋则古文大昌；宋元以来，又有白话体之小说戏曲。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废文言而用白话。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诚如彼等所云，则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而何以唐宋以来文学正宗与专门名家，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此吾国文学史上事实，岂可否认以圆其私说者乎？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驳之曰：

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正为古文之后还有那背时的骈

文；白话已兴之后，还有那背时的骈文、古文，所以有革命的必要！若古文之后无骈体，白话之后无古文，那就用不着谁来提倡有意的革命了。

胡先骕作《评尝试集》两万余言，其中一段云：

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为死活。故荷马之诗，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乔塞(Chaucer)之诗，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梭和科(Sophocle)之戏剧，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席西罗(Cicero)之演说，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蒲罗大(Plutarch)之传记，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反而论之……陀司妥夫士忌(Dostoevshy) 戈尔忌(Gorky)之小说，死文学也，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朽也！适之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适之君辈之诗之鲁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

此种诅咒式的理论，难怪胡适以为“不值一驳”，只在《尝试集》“四版自序”答之曰：

这几句话，我初读了觉得很像是骂我的话；但这几句话是登在一种自矢“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此为《学衡》杂志发刊四宗旨之一——编者）的杂志上的，大概不会是骂吧？无论如何，我自己正在愁我的解放不彻底，胡先骕教授却说“鲁莽灭裂，趋于极端”，这句话实在未免过誉了。至于“必死必朽”，倒也不在我的心上。况且胡先骕教授又说：“陀司妥夫士忌、戈尔忌之小说，死文学也，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

朽也。”胡先骕教授居然很大度的请陀司妥夫士忌、戈尔忌来陪同我同死同朽，这更是过誉了我，我更不敢当了。

五 “整理国故”问题

这样，新文学运动战胜了封建作家林纾等及进步的士大夫阶层“学衡派”以后，因一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开始对封建势力投降，于是有所谓“整理国故”的问题发生：

在文学的方面……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 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 吴敬梓、曹霁，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学方面，“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典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价值。”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看出它们（指国学）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我们现在应该走的路，自有现时代指示我们，无须向国故中讨教诲。所以要整理国故之故，完全是为了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国故里的文学一部分整理了出来，可以使得研究文学的人，明了从前人的文学价值的程度更增进，知道现在人所以应作新文学的缘故更清楚；此外没有别的效用。

——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

要指出旧的文学的真面目与弊病之所在，把他们所崇信的传统信条，都一个个的打翻了。……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总之，我的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征不信”，以科学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

——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

这些是要‘整理国故’的理由或作用，一句话可以包括：“还国故一个本来面目！”我们姑无论以当时的‘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是否可以正确的达到这个目的；向当时的人士要求十年后郭沫若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眼光’和‘方法’，也是不应该的。然而自己既然不能随着新文学运动前进，“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成仿吾作《国学运动的我见》）；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这本是“只要本着良心行动，各就性之所近，各就力之所能，原不当受第三者的干预”的事情。但是“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郭沫若作《整理国故的评价》）今天你拟一个“国学必读书目”明天我拟一个“最低限度国学必读书目”，真是“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舐这数千年的枯骨”（成仿吾语）而整理的结果：“综观年来的成绩，我只见有考证几篇，目录几个”（成仿吾语）。且流毒所致，贻害青年。正如李茂生在《国故大家应负的责任》里所说：

国故大家且莫慌，待我来说得明白，你们自己治国故，是你们的自由，你们的兴趣，谁也不能非议你们；你们时常将自己的收获“发一发表”，将自己的方法“金针度与人”，我们也很感激你们的盛意。但是这里边就有你们贻害于人的机缘潜伏着了。你们虽然说，“我这一点是治国故而得来的，我是这般

那般地治的”；然而人间缠夹二先生之多尤甚于夏天之苍蝇，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听得清楚你们这些话。他们只会麦柴当弓箭，喊一声“得令！现在要奉国故，吃国故了”；——如国故毒的校长先生之类，你们虽不认他们是你们的同伴，而他们所中的确是你们的毒，岂不是你们害人不浅吗？（他们的血分里本来有染疫性，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我尤其痛心的，就是你们侵占了教育上的权力，你们于中学的课程中涂上了国故的色彩，对于学生们作演讲，开书目，又复“笔锋常带情感”是不是个个学生都要走上你们的路，才算得平平常常正正当当的人，这问题且不要论他；只问你们自己为金针度人，到底能够承受你们的金针的有几？住在寄宿舍中，伏在图书馆里，捧着线装书，看下去实在无聊，不看又觉得背时，因而闷闷不乐，只觉青年之就萎的，到底有多少人，我们是无从知道。我们可以看出版物上的青年作物，今天来一篇某某和尚的人生观，明天来一篇庄子的宇宙观，后天来一篇《学记》中的教育学说，大后天来一篇王阳明或什么人的评传，他们忘了你们的金针，只是这么横穿瞎缝，莫说是鸳鸯，连乱柴也不大像，这是谁的罪过！坐令许多青年在乱草中盲冲乱撞，治是治不来，只弄得迷了方向，自己不认得自己，甚且奉国故吃国故起来，以为只此以外，别无他美，别无至味。你们固然始料不及此，然而你们的祸等于洪水猛兽了！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吊青年的膀子；你们自去做你们的专门之业；你们自到大学的国学门中去当你们的教师（好在你们都已当了这职务了）。你们如有收获，结出某项某项的总账，我们也欢喜知道这些，作为我们的常识；如其编什么史什么史的时候，当然要采取你们的收获，作为饷与青年乃至非青年的粮食；惟有你们要有意的敲着鼓导引青年的缠夹性是不对的，所以我希望你们隐灭，像魔怪的倏尔消形一样。

我说这一些话似乎是无的放矢，其实我的确是有感而然。平日积在心头，似觉说出来也多事，于是不说了；近日看见国故毒的校长先生的议论，以及他学校里的会考题目，突然引起旧感，颇有点世道人心之忧。若是不说，就觉得我也负着一分罪孽，所以不得不写出一些。要知道给这样的校长先生中一点毒，就是毒死了，究竟是已过的人物，尚没有什么可惜。惟有他自己中了毒，还要当是一种惟一的补品，——分给青年学生，这是前途的大悲观，决不是平平常常的事；“予岂好辩哉”！

况且尚有无数的青年学生直接从你们那里中了毒，治既治不来，吃下则不能消化，徒然弄得半死不活，国故大家休矣！你们安安静静做着自己的事吧，不要再向青年们乃至社会上提倡了！

“于中学的课程中涂上了国故的色彩”，影响所及，就一直到了现在。

六“甲寅派”的反对

这新文学阵营内有些分子对旧文化投降以后，于是又来了“甲寅派”对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抨击。章士钊在 1925 年办《甲寅周刊》，成为反对新文学的大本营。其实新文学自“五四”以后，已植深厚基础，绝非章士钊一人之力所能攻倒。不过当时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彼为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面有逐臭之夫为之鼓吹，一面又可利用部令禁止学校教授白话文。对此反动势力故不可轻视，于是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高一涵、吴稚晖、成仿吾等，均纷纷撰文抨击章氏。黎锦熙、钱玄同更出版《国语周刊》与《甲寅》对垒；《甲寅》不收白话，《国语周刊》不收文言，恰恰相对。

章士钊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